

薩仁高娃 著

西藏阿里地區
蒙古文散吐
研究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薩仁高娃 著

西藏阿里地區
蒙古文散叶
現 究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藏阿里地区发现蒙古文散叶研究 / 萨仁高娃著. --北京 :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3. 7

ISBN 978 - 7 - 5013 - 5130 - 5

I. ①西… II. ①萨… III. ①蒙古语(中国少数民族语言) - 文献资料 - 研究 - 阿里地区 IV. ①G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38908 号

书 名 西藏阿里地区发现蒙古文散叶研究

著 者 萨仁高娃 著

责任编辑 耿素丽

出版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100034 北京市西城区文津街7号)
(原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发行 010 - 66114536 66126153 66151313 66175620
66121706(传真) 66126156(门市部)

E-mail btsfxb@nlc.gov.cn(邮购)

Website www.nlcpress.com → 投稿中心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河北三河弘翰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张 16

字数 270 千字

印数 1—1000 册

版次 2013 年 8 月第 1 版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 - 7 - 5013 - 5130 - 5

定价 52.00 元

序

本书作者萨仁高娃目前为我馆援藏干部,能够在我馆工作期间利用古籍普查新发现撰写著述,是我馆科研工作的一大喜事,也是西藏古籍普查工作的一大成果,可庆可贺。西藏自治区图书馆是自治区“八五”重点建设项目之一,1983年设计,1991年动工修建,1996年正式开馆,是全国建成较晚的省区级公共图书馆。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07]6号)精神,2010年,西藏自治区古籍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下发了《西藏自治区古籍普查工作实施方案》,启动了西藏古籍普查保护工作;2011年,在西藏自治区图书馆增设西藏自治区古籍保护中心的牌子和职能,负责全区古籍普查保护的具体业务工作,初步形成了以自治区古籍保护中心为主,地市县文化部门、收藏单位、个人参与为主体的古籍普查和保护网络体系;自治区和各地市共举办了8期古籍普查保护培训班,参训人员达到500余人;组织申报了第一至五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和“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全区已有158函古籍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西藏博物馆、布达拉宫管理处、西藏档案局(馆)、罗布林卡管理处4家入选为“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完成了阿里地区 and 那曲地区古籍普查工作任务;协助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研制了“藏文古籍普查登记平台软件”,确定了藏文古籍普查平台一、二、三级分类和藏文古籍著录规则;出版了《雪域宝典——西藏自治区第一、二、三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藏汉对照图录》等古籍保护成果;成立了“西藏自治区古籍保护专家委员会”;将色昭古籍搜集整理室等民间古籍保护组织纳入了政府管理序列。

在几年的全区古籍普查工作当中有了不少新发现,如,山南隆子县发现不同时期古籍写本近千函,中有5函写本为《吐蕃喇蚌经》,意为“御经”,是吐蕃晚期王室内供奉的佛教经典《十万般若经》之专用名称,唯赞普所御用,极具历

史、文献价值。其版框规格、缮写字体特点、叶面行数、缮写质地等均与举世闻名的敦煌文献如出一辙。特别是《喇蚌经》尾跋中出现的缮写和校对者名称,如赵悉诺勒抄、白央校、发达尔二校、宴文三校等,完全与敦煌文献尾跋中出现的人名为同期的敦煌僧统。继西藏自治区图书馆藏元刻《因明正解藏论》和西藏博物馆藏元刻《释量论》,2012年古籍普查当中拉萨市尼木县发现数量不菲的元刻本,其中最为突出的为分别以汉字“日”“月”“地”“中”“德”“元”排帙号的《量理宝藏》《阿毗达磨杂集论》《大乘庄严经论》《律藏》《阿毗达磨俱舍论》《三律仪轨》等六种古籍,充分体现萨迦王朝与中央政权的密切关系。

本书所研究的对象西藏阿里地区托林寺所藏蒙古文散叶,亦西藏古籍普查当中的重大发现之一。散叶长年沉睡于古寺中,无人闻其为何物、有何背景、价值又如何。一部蒙古文历史文献,能够传入西藏,并在本地得到抄写,本是一段传奇的佳话。而在古籍普查当中能够发现它,学者又能够围绕它进行研究,揭示其历史谜底,无论从古籍普查角度,还是从学术研究角度讲,均实现了我们古籍工作者将珍贵资料公布于世,为学界服务的理想和初衷。

散叶作为《蒙古秘史》民间流传的异本,势必为资料欠缺而苦于推进的百年秘史学输入新鲜血液,将《蒙古秘史》的研究推上一个新的台阶,这也是西藏古籍普查工作为各学术领域所作的贡献之一吧!望西藏古籍普查当中出现更多新资料新发现,出现更多研究成果!

西藏自治区图书馆馆长 西藏自治区古籍保护中心主任

努木

2013年3月于拉萨

序 言

本书作者萨仁高娃是在本世纪初才走上工作岗位的一名年轻学者。从她的工作履历来看,短短十来年间,除了出色地完成本职工作之外,还利用闲暇时间,勤奋写作,笔耕不辍,公开发表了数量可观的著述,以其实实在在的研究成果,在相关学术领域已经崭露头角,并受到学术圈内专业人士和同行的首肯。尤其是最近几年,以援藏工作者的身份在西藏自治区图书馆担任副馆长职务,在具体从事图书馆正常工作期间,直接接触藏族同胞,身临西藏各地著名寺院,亲手触摸藏文典籍,的确获得了其同龄人无法比拟而千载难逢的机会。在此历练的过程中为自己的成长增添了多彩的阅历,积累了难能可贵的经验。这段非同一般的经历,无疑对她日后的工作、学习和生活将产生深远影响。

《西藏阿里地区发现蒙古文散叶研究》是她在西藏自治区古籍普查工作期间,以所发现阿里托林寺藏蒙古文散叶为研究对象完成的一部学术专著。观其图片,略发黄的长条上用回鹘式蒙古文手写的抄本散叶,尽管语句略有不同,但仍散发着《蒙古秘史》的中古气息。这一抄本蒙古文献的几叶及其文字,实际上早些年已被资深学者辨认、释读并加以评论。但是,萨仁高娃博士搜集整理和释读的文本,无论从叶数或文字内容而言,显然比前几年的发现要多得多。结论是该文本虽然残缺不全,但其价值却不可低估。这些原文的发表,必然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兴趣。

众所周知,《蒙古秘史》是蒙古族最早以口述与文字描述相结合,浸透着浓郁草原文学色彩的编年体历史文献。其波澜壮阔的时代背景、风格独特的生活细节,以及战马嘶鸣、刀光剑影、无数勇士所向披靡建立的横跨欧亚大陆的蒙古帝国的历史场面,早已引起国内外广大读者和研究人员的强烈关注。尽管从事整编、研究《蒙古秘史》的工作已经延续了数百年,但是仍有很多谜底尚未得到

科学阐释。譬如其作者为何人,起先是以什么文字撰述的,是否有蒙古文本在民间流传等等,均不得而知。正因如此,《蒙古秘史》的吸引度才没有减退。至于该《蒙古秘史》的民间抄本,从其所使用的语言文字特征和语法风格等多方因素综合考虑,先睹者初步判断其底本形成时间大致在 13 世纪后半叶至 16 世纪后半叶之间。倘若此判断成立,这一属于早期回鹘式蒙古文抄本的发现,除了打破《蒙古秘史》蒙古文抄本信息长期沉寂的局面之外,还会产生震惊蒙古学界的轰动效应。相信萨仁高娃所整理释读并加以考证的这本学术著作,也会引起国内外蒙古学界的普遍关注和热议。劝君有空或有缘也翻翻此书,浏览其文,定会 有所收益的。

珍藏于西藏托林寺的《蒙古秘史》流传本部分散叶,本身也是一个谜。该文本究竟何时经何人如何到达此寺的?是随着元亡而撤离中原的藏地僧人或蒙古文人携入西藏,抑或是随着明代蒙古和藏传佛教再次建立施主与福田关系之后,频繁穿梭于蒙古和西藏地区间的传教者或信徒中的哪一个带入的?无论哪种可能,文本本身的存在承载着蒙古和藏民族在长期文明交往过程中的某一段历史记忆。它也从另一个角度证实和见证了蒙藏民族在历史上铸造的特殊关系。令人期待的是它所传递的各种信息,诸如文本自身蕴含的文献价值与该文献如何传承并珍藏至今等等谜团。每当谜底得到层层剥离并被逐一揭开,将会不断丰富人类的文化内涵,提高我们的认识水准。愿包括萨仁高娃博士在内的所有为致力于破解《蒙古秘史》谜底而辛勤工作的人们,获得圆满,更上层楼。

自本书作者向我提出索求序言的意向起,我一直处于似乎可以说点什么,但又说不出所以然的忐忑与恐慌状态之中,等到实在无法再拖延时日的情 况下,勉强写出以上文字,佯作序,惭愧至极。

乌力吉巴雅尔 2013 年 1 月 31 日识

目 录

序	努木	1
序言	乌力吉巴雅尔	1
第一章 导论		1
一、蒙古族历代史料文献回顾		1
二、20 世纪以来发现的蒙古文文献		5
三、《蒙古秘史》版本脉络		14
第二章 西藏阿里地区托林寺藏蒙古文散叶及历史背景		21
一、西藏阿里地区托林寺藏蒙古文散叶概况		21
二、托林寺历史沿革		31
三、蒙藏关系史回顾		39
第三章 散叶特征及拉丁文转写		53
一、散叶特征		53
二、散叶拉丁文转写		56
第四章 词语对照及分析		117
一、词语对照		117
二、散叶中的不同语句		176
三、词语分析		196

第五章 词语索引 209

一、索引说明 209

二、索引 209

参考资料 244

后记 萨仁高娃 249

第一章

导 论

一、蒙古族历代史料文献回顾

蒙古族自古具有口传族谱、纂修民族历史的传统。随着历史的发展,借用回鹘文创制回鹘式蒙古文以后,不断以文字记载民族优秀文化,留下了众多不朽的经典。至今流传下来的最早的回鹘式蒙古文文献为 1818 年发掘自喀拉吉拉河岸的《移相哥碑》。因碑文第一行以“成吉思汗”为始,故以“成吉思汗碑”著称。公元 1225 年,成吉思汗西征归来后举行全蒙古诺颜参加的射箭比赛。移相哥为成吉思汗三弟哈撒尔次子,多年随从大汗身边,深得大汗的信赖,并以高超的箭术著名。射箭比赛中,移相哥从 335 步远的距离射中了靶心,轰动了全蒙古草原。为纪念移相哥高超的射箭技能,成吉思汗专为他树立举世闻名的《移相哥碑》。碑高 202 厘米、宽 74 厘米、厚 22 厘米,将 21 行碑文分 5 行镌刻。全文译文为:“成吉思汗讨虏花剌子模国还师,全蒙古国官人聚会于不花速赤孩之际,移相哥射矢中三百三十五步处。”此为现存最早的蒙古文石刻,藏于俄罗斯圣彼得堡埃尔米塔什博物院。

继《移相哥碑》后,现传最早的蒙古文史料应为《蒙古秘史》。

(一)《蒙古秘史》

蒙古族首创的蒙古文历史文献应为《蒙古秘史》(以下简称《秘史》)。该文献以编年体如实记述蒙古族起源、发展及成吉思汗统一长年征战不休的蒙古高原,建立强大的蒙古帝国等史实。以古代传说中的孛儿帖·赤那、豁埃·马阑勒

为蒙古族祖先为始,记录了至成吉思汗三子窝阔台继承皇位,灭金朝,建立统一的中华大地,作出伟大贡献的不朽功绩。《秘史》为蒙古族史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与罗桑丹津《黄金史》及萨囊彻辰《蒙古源流》一同成为蒙古文三大历史文献。又与《元史》《史集》一同称作蒙古族三大史学经典。与《格斯尔》《江格尔》一同称为蒙古族三大文学作品。能够与汉文《史记》《战国策》等优秀经典并肩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宝库中的璀璨明珠。然而,以回鹘式蒙古文写成的杰出作品,其蒙古文原本未能保存至今,而用汉文音写蒙古语,并用汉语翻译的汉文版《元朝秘史》经后人辗转影抄留存到现在,今人通过此汉文本才得以了解该杰作。明代洪武年间成书的《元朝秘史》的原版至今未发现,现存《秘史》的十二卷本和十五卷本均非明代版本,而是以明版为蓝本,经多人辗转影抄下来的不同抄本的翻版。

(二)《十善福经白史》

继《秘史》之后,蒙古历代学者撰写、编修了不少史学典籍。但是,14世纪末至16世纪初,蒙古内部封建势力间战乱不断,蒙古社会长期处于分裂割据状态,严重影响了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此间,编纂经典著作的传统不但受到阻碍,以往所流传下来的史书也受损严重,甚至有的已销声匿迹。因而,流传至今的文献,多成书于16世纪之后,即蒙古内部战乱结束,社会处于相对安宁的局面,黄教在蒙古地区得到广泛盛行的明代及之后。此阶段形成的文献虽有承袭《秘史》的元素,但受黄教影响,其书写风格与内容结构上出现了明显的改变,甚至因为著者观点、时代需求不同,大多数经典已远离《秘史》的内容、结构与特征。

《十善福经白史》是自目前发现的《秘史》之后最早的一部经典,是忽必烈汗(1260—1294年在位)编纂,后于1578年前后由鄂尔多斯呼图克图彻辰洪台吉(1540—1586)拾得,并整理修订而成。该著作专门叙述了政教统一、平衡发展的时代特征。

(三)17世纪蒙古史学资料

17世纪时,蒙古族史学作品如雨后春笋般涌出,至今所知大多数著作均形成于此阶段。

1.《俺答汗传》

该著作是17世纪时期形成的第一部史学作品,以诗体形式极为优美地叙述了土默特俺答汗(1507—1582)的生平事迹和黄教始传蒙古地区的情况。其著者与俺答汗为同时期人,后又由佚名氏重新编纂,约于1607—1612年间完成。末页附有成吉思汗至乌珠穆沁右旗的王统世系,应为17世纪末添加内容。

2. 《诸汗源流黄金史纲》

简称佚名《黄金史纲》,约成书于1625—1627年间,学界公认的蒙古族三大历史著作之一。简要记录了印度摩诃萨摩迪王至蒙古林丹汗的印度、西藏、蒙古王统。蒙古王统部分的前一段记述蒙古族先祖及铁木真称汗之前的事迹,与《秘史》的记录较为一致,极具史料价值。

3. 《蒙古·卫拉特法典》

17世纪中期,面对沙俄入侵的威胁和清军统一漠南蒙古的形势,漠西蒙古和喀尔喀蒙古的封建主意识到了维护封建统治、加强封建秩序、巩固和加强部落内部团结、一致对外的重要性。基于这种共同利益的认识,公元1640年(明思宗崇祯十三年、清太宗崇德五年)九月,在准噶尔部首领巴图尔珲台吉的倡导和支持下,联合喀尔喀蒙古札萨克图汗,在塔尔巴哈台召开了卫拉特和喀尔喀的蒙古封建主会议,有各部44位蒙古封建主参加,制订了《蒙古·卫拉特法典》,以此作为维系内部统治、协调各部关系、加强封建统治、共同对外的基础,从而大大加强了准噶尔部的实力和蒙古各部的团结,使漠西蒙古地区出现了安宁和稳定的局面。当时在俄国伏尔加河流域驻牧的土尔扈特部首领和鄂尔勒克,也率其子书库尔岱青等参加了这次会盟。

4. 《古代蒙古诸王奠定的国家制度之著作简要汇总黄金史纲》

学界称罗桑丹津《黄金史》(以下简称《黄金史》),约成书于1635年。书中含《秘史》232节内容,结尾部分则借鉴了《黄金史纲》。所含《秘史》的232节内容,尽管语句上与转自汉文版的《秘史》有所不同,但对于蒙古史学界,其价值非同一般。

5. 《蒙古源流》

原名《额尔德尼一因托卜赤》,由鄂尔多斯部萨囊彻辰撰写,成书于1662年。后译成满文,又从满文译成汉文。内容上从开天辟地记述到明末清初。其重要史学价值和文学价值为:一是提供了元末至清初蒙古大汗的完整系谱;二是详细记载了达延汗统一蒙古本部的过程;三是提供了达延汗诸子名号及其所属部落名称;四是真实而生动地描述了鄂尔多斯万户的历史;五是记录了格鲁派

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传播的历史;六是反映了北元时期蒙古社会组织、部落变迁、经济状况、阶级关系、思想意识、封建主之间的关系等诸多方面的历史面貌。

6. 《阿萨拉克齐史》

由喀尔喀土谢亚图汗部的边巴撰写,成书于1677年。该著作前半部分借用《黄金史》或佚名《黄金史纲》,史料价值极高。后半部分则详细记录了巴图孟克达延汗(1461—1504)及其幼子格埒森扎(1501—1548)的世系。

7. 《纳伊济·托音传》

由卫拉特达摩·萨木达拉撰写的传记,成书于1679年。记述了卫拉特纳伊济·托音一生事迹,同时扼要记录了卫拉特史。

8. 《札雅班第达传》

1690年由卫拉特僧人喇德纳巴达喇撰写,又称《纳木海扎木素传》,详细记述了札雅班第达的生平事迹和卫拉特史。

(四)18世纪蒙古史学著作

1. 《恒河之流》

1725年乌珠穆沁右旗奈布扎布撰写。此著作从成吉思汗第十三世祖孛端察尔起详细记录至成吉思汗第二十二代子孙林丹汗的黄金家族史。末节记述了蒙古各部落源流。

2. 《金轮千辐》

全名《黄金家族之系谱,黄金氏族之心娱,九章之篇金轮千辐》,成书于1739年。著者答里麻,昭乌达盟扎鲁特右旗人,18世纪蒙古僧俗六大史学家之一,三大喇嘛学者之首。全书分六卷,内容为:第一卷记述宇宙的形成,人类的起源,印藏王统及蒙古黄金家族的起源;第二卷为成吉思汗的历史;第三卷为成吉思汗诸子如术赤、察合台、窝阔台、拖雷以及元朝诸帝简史,北元毕力格图汗至林丹汗为止的蒙古政教史;第四卷为达延汗及其诸子和成吉思汗九卿之一者勒蔑后裔的历史;第五卷为成吉思汗诸弟哈撒儿、别勒古台、合赤温等的后裔谱系,青海蒙古诸部起源及谱系;第六卷中解释了“五色四夷国”,叙述了成吉思汗诸臣及卫拉特部的起源,还有成吉思汗弟哈撒儿的后裔。其突出的史料价值为对明代蒙古部族的历史有较完备而详细的记述。

3. 《大黄册》

以编年体撰写的史书。以成吉思汗黄金家族史为主线,以黄教理念做主导,

从开天辟地记述到蒙古帝国灭亡为止的蒙古皇史。同时也详实记录成吉思汗子孙世系及其封地、西部卫拉特蒙古源流、达延汗及其幼子格埒森扎的后代。

4. 《水晶珠》

成书于 1775 年。著者拉喜彭斯克为巴图孟克达延汗的第十代后裔,昭乌达盟巴林右旗人。该书由五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蒙古概况;第二部分为蒙古王统世系;第三部分为蒙古历史;第四部分为蒙古后裔王公;第五部分为其他王公世系。

(五) 19 世纪蒙古史学文献

1. 《水晶鉴》

乌拉特中旗金八道尔吉所著史学文献,始于 1846 年,1849 年完成。内容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宇宙的形成、释迦牟尼创建佛教以及佛教发展史略、印度王统世系等;第二部分为汉、藏两地地貌、政治概况、王统世系以及教法发展史;第三部分为蒙古史,以编年体形式叙述清朝之前的蒙古事迹,基本沿袭前人的著作。著者将笔墨重点集中于清朝时期的蒙古历史上,尤其较为详实地记录清政府如何统治蒙古、青海和硕特部固始汗,如何占领西藏及其后裔,如何管理西藏等。作者出身于喇嘛,因此书中不免时有将历史事实与佛教传说混为一谈,视佛教传说为历史事实的现象。

2. 《金鬘》

纳塔所著佛学史书,成书于 1817 年。主要述说蒙古地区佛教发展史以及历代佛学人士的事迹。与本书关系不大,故不详述。

19 世纪时,出现过众多佛学著作,因与本书关系甚少,故不一一列出。

以上诸多蒙古史料文献中,《蒙古秘史》及含其内容的罗桑丹津《黄金史》、佚名《黄金史纲》和边巴《阿萨拉克齐史》成一系,《蒙古源流》《大黄册》《水晶鉴》等则成另一系。而前一系,作为蒙古族传统史料编纂风格的代表,其原本流传者甚少,尤其奠定蒙古史料文献基础的《秘史》蒙古文原本,一直未现,确为学界一大憾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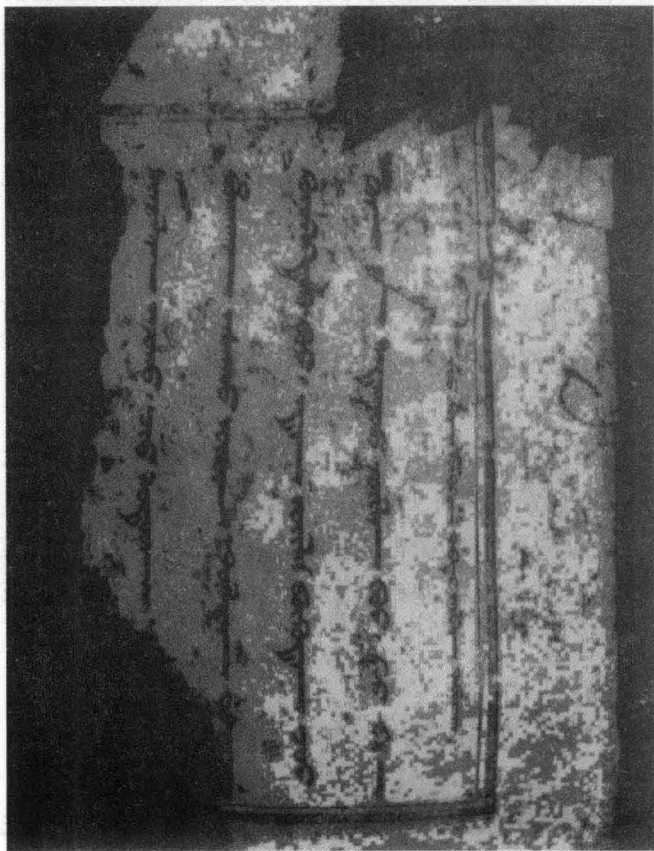
二、20 世纪以来发现的蒙古文文献

20 世纪以来,我国各地及蒙古国纷纷出土数量可观的蒙古文文献,对推进

蒙古学研究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一) 黑水城出土蒙古文文献

1907 年到 1909 年间俄国东方学家柯兹洛夫 (P.K.Kozlov, 1863—1935) 率领俄罗斯皇家地理学会探察队到中亚即东部藏区进行考察, 并从位于今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达来呼布镇东南哈喇浩特, 即黑水城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的西夏文书籍及残片、为数可观的藏文文献和部分蒙古文残片。对此批残片, 国内学术界虽有一些研究, 但对其文字、内容直到目前知者甚少。匈牙利蒙古学家卡拉·捷尔吉 (D.Kara Gyorgy, 1935—) 于 2003 年在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所编《东方文献》(第 9 卷, 第 2 辑) 上, 发表了从哈喇浩特出土的 19 件(包括回鹘文 1 件)蒙古文印刷品和手稿文书(大部为残片)的全部照片及其拉丁文转写, 并撰写评注, 为学术界提供了极为珍贵的中世纪蒙古文文献参考资料^①。



黑水城出土蒙古文
献编号 G110 正面



黑水城出土蒙古文文献编号
G110 背面

这些文献内容极为丰富,除有早期借贷文契、寺院经济、契约文书、信件等蒙古社会经济文书外,也有佛经故事,入官、推官等官方文书,尤其发现的成吉思汗与阿鲁剌惕氏的字斡儿出那颜(G110 背面)、忙兀惕部的智者之间对话的残片,是属于成吉思汗的至理名言以诗歌韵律体出现的早期文献。

另有《也先帖木儿给西域火洲之地官员的令旨》,是蒙古统治者管理西域的范例之一。

(二) 吐鲁番发现的蒙古文文书

新疆吐鲁番发现的蒙古文文献,是 1902—1914 年间由德国柏林民族博物馆,以及后来的普鲁士科学院吐鲁番委员会先后组织四次考察队派往新疆吐鲁番地区进行考古发掘所得。通过四次发掘共获得 105 张蒙古文文稿,其中多为元明时期的文书。自从艾里希·海涅什(Erich Haenisch)于 1959 年发表《柏林

吐鲁番文集》(*Berliner Turfansammlung*), 将大部分蒙古文文献影印公布以来, 其中的许多残叶被欧美各国和蒙古国的蒙古学家们研究整理过。其中 1993 年蒙古国的策仁索德纳木(D.Cerensodnom)和德国的陶贝(M.Taube)合作刊行的《柏林吐鲁番集中的蒙文文献》成为最新最完整的研究著作。

吐鲁番发现的部分令旨是盖有红色印章或黑色印章的完整的畏兀体蒙文官方文书, 这些文书对研究河中地区察合台汗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风土人情等方面极具资料价值。

(三) 桦树皮文献

1930 年, 有一位农民从中世纪属于金帐汗国或术赤兀鲁斯(约 1243—1502)领土的原苏联伏尔加河右岸下游的一座古墓葬中, 发现了带有装订线的 25 叶桦树皮文献, 其中的 13 面写的是回鹘式蒙古文, 为 13 世纪末的文献。学术界将其称为《金帐桦树皮文书》, 亦称《母子情感歌》。这首情感歌描写了一个蒙古普通母亲送儿子服兵役时的叮咛和远征的儿子思念母亲、思念家乡的情感, 是来自民间的一首对唱歌。原件今收藏在俄罗斯圣彼得堡艾米塔尔(Ermitar)博物馆。

(四) 敦煌莫高窟发现蒙古文文献

1900 年, 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的大量汉文、藏文、于阗文、回鹘文、粟特文等文献, 震惊了全世界。因历史背景以及藏经洞封闭等原因, 从中未发现蒙古文文献。然而, 斯坦因第二次中亚探险, 从敦煌藏经洞带走的收集品中有一件回鹘文《阿毗达磨俱舍论实义疏》写本, 其末尾回鹘文《观音经相应譬喻谭》的最后一叶出现蒙古文题记“光绪三十年”(1904), 可见此件回鹘文文献非藏经洞出土者, 经考证, 确为敦煌莫高窟北区伯希和所编 181 窟所出。详情请参阅笔者拙文^②。

自 1988 年至 1995 年, 敦煌研究院考古研究所组织相关领域专业人员对莫高窟北区石窟进行全面而系统的考古发掘, 获得汉文、藏文、西夏文、回鹘文、梵文、蒙古文、八思巴文等为数众多的文献资料。其具体情况为: 莫高窟北区 13 个窟里出土了回鹘式蒙古文文书 52 件, 另还出土回鹘式蒙古文残片 17 片, 有三个石窟发现八思巴文文书 6 件, 出土八思巴文碎片 4 片。